

我為孫文文學說而戰(中)

——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

●任卓宣遺著·尉素秋校訂

抗日軍興自漢回川

真是有緣！此出版社之主角鄭學稼先生，留日歸來，適逢我與中央大學文學系畢業的尉素秋女士結婚，由我在北平高等法文專修館的蔡館長元培師證婚，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宣言的十教授多人作賓客。鄭學稼先生回來致賀。他是很反共的，在復大任教，與共幫學生，爭辯甚烈。他要兼事文化，遂與我合組真理出版社，準備辦一雜誌。因我在「二十世紀」中獲得一些讀者，成了朋友。如江西之吳曼君、廣西之王貽非、湖南之張益弘和張絢中、江蘇之楊燦等。有的人且已約到上海了。

但因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上海也發生戰爭了。只有停止進行之一途。大家遂離開上海。我同素秋回四川。在過南京途中染病，入鼓樓醫院治療。稍痊，撰「抗戰的根本問題」一小書，時在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於南京。因水路不通，乃乘火車由南京而徐州而鄭州、漢口，再乘船到萬縣。

在萬縣有一新友劉明陽，並不孤寂。而請我

往學校講演抗戰問題者甚多。當時遷到湖北江陵的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康澤將軍，聘我為該班高級教官。課程由我決定，時間可集中排。適我正著「中國的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遂以此為課名，在一週內講完，即往武漢小住。而康主任兼武昌中央政校特訓班主任，又請我去講課。我同樣的課名在一週內講完。

同時，「中國的現階段及其將來」一書，已寫好了。其結論大意是說：中國革命的理论，不是斯大林 (Joseph D. Stalin) 的階段革命論，也不是托洛斯基 (Leon Trotsky) 的不斷革命論，而是孫中山先生的一次革命論。後者要有證明纔好。

乃到武昌街上逛書店，買得上海廣益書局的「孫中山全書」隨意翻閱，看到「民報發刊詞」中說：「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非常高興！

此書於二十七年九月，由抗戰出版社印行。較早之「抗戰的根本問題」呢？到同年一月，由民族出版社印了六千本。我見到漢口「掃蕩報」有書評介紹。同年拔提書店也印行了。軍事委員

會別動隊總隊部翻印，列為指導叢書第四種。西安和廣州亦有翻印本。總之，印行甚多，流傳得廣。「中國的現階段及其將來」呢？我無所知。此書比前書為大，有十三萬八千多字。前書僅二萬六千多字。

現在說文章。我初到漢口，書店中擺的雜誌，中共最多，內容偏於民主、自由、民衆運動等等，都是利於中共而不利於國民黨、政府和抗戰。其不合於抗戰需要甚明。因此，我針對那些問題寫了「關於民主政治」、「關於政治機構」、「關於政治黨派」、「關於民衆運動」等一系列文章，先後寄漢口「掃蕩報」，因其社長丁文安和總編輯陳友生皆留俄同學，會晤時俱向我索稿也。

這一系列文章，先後發表了，影響之大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第一，共產黨及其「人民陣線」用了種種方法對付我。最重要的是從各方面努力阻止「掃蕩報」之繼續刊載。第二，在朝、在野都有多人特別注意。有些素昧平生的人約我晤談，或來寓訪問。第三，報紙和刊物之轉載摘錄、編輯成書，均屬不少。這些話，是後來，我把

這一系列文章編成「抗戰中的問題」一書的「序言」中語。此書在二十七年五月抗戰出版社印行，三十年六月時代思潮社亦印行了。

根本否定共產邪說

我並不因共產黨及其『人民陣線』之對付而氣餒。反之，我竟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它，尤其毛澤東常言『中國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要反帝、反封建。』我以為既然如此，就需要三民主義，不需要共產主義了。這是中共主張唯物史觀，從歷史階段立論，以談中國需要，自然如此。那末中國有國民黨就夠了，不需要共產黨。這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因此，我把那些道理詳加說明，寫成一篇長文章，名之曰「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問題」。有些反共的國民黨人，把它印成單行本，出版問世，甚為流行。

中國共產黨對此甚感頭痛，又無法反駁。於是他們就採用造謠誣陷的手段，誣我為『托派』。中共常以托派為漢奸。於是又罵我為『托派漢奸』，我遂請一律師在報上刊登啟事，如中共報刊再誣以『托派漢奸』，當訴諸法律。現在要說的，是共產黨和其『人民陣線』用種種方法對付我的結果，使『掃蕩報』及國民黨辦的報刊，均不登載我的文章了。這就使我有話無處說，有文無處發表了。

但我在文化界中並非孤獨的蠢才。而且還有辦書店、辦雜誌的興趣和經驗。何況當時中國藝文社又支持我呢？於是拿出從前在成都、在上海

的辦法來，函約吳曼君和張益弘二人來漢口，遂創辦「抗戰嚮導」，由他二人分任社長和主編，我僅寫文章。其第一期出版於二十七年三月。鄭學稼和張絢中兩好友亦常常寫稿。但因戰局變化，政府撤退南京是遷往重慶，武漢不過途中休息而已。我則因陝西省府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約往講課，在武昌所寫之「孫中山全書提要」一書稿，亦攜到重慶了。

我到重慶即準備買飛機票往西安。到後，被安排在董子祠內居住。除為戰時行政人員訓練班（後改為省訓練團）講課外，它如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中央軍校分校及西北青年訓練班等，亦均約往講演。停留二、三個月始返。由西安到成都，四川省訓練團約為講演，然後由成都到重慶。

深入研究三民主義

我在重慶市郊農村租屋居住。無固定工作，專事研究、寫作。發表文章多在「血路」、「抗戰與文化」、「青年嚮導」、「時代精神」等刊物上。因為專事研究、寫作，又想辦雜誌。而在武昌購得「孫中山全書」以後，研究重點遂為三民主義了。因此想辦「時代思潮」，成為「專門研究三民主義的理論刊物」。我的朋友，除張益弘在成都外，吳曼君、張絢中及宗任任一黎俱在重慶，可寫文章。還有由萬縣新得的願同我一起研究的蒲茂騰，同任校對及經理。人手就夠了。總經理由中國文化服務社任之。

我把辦「時代思潮」的計劃，告知留俄同學

康澤將軍，他願意支持。因我在上海七年專事文化工作，使他特到上海會晤，談一個上午。他要我參加他們的政治和文化活動，我辭去了。因我的興趣在學術思想，遂問我要買甚麼書。答以擬買中華書局的「洋裝四部備要」一部。他慨然奉贈，當政府停留在武漢時，他助人辦「大時代」，我曾為之撰稿。他知我、助我，又悉我受知於先總統蔣介石先生（另文談及不贅）。所以，他全力助我出版「時代思潮」。

這個刊物，創刊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它在刊名上或下註明「專門研究三民主義的理論刊物」。其第一期，在「發刊詞」後有葉青之「三民主義的創造性」，任一黎之「民生主義概論」；滌非之「和平轉變的哲學基礎」，吳曼君之「總裁的國家思想」（上），張絢中之「國民黨怎樣為民主政治奮鬥」，編者之「三民主義思想論文索引」。我會面交一本於劉炳藜教授。他是當時寫了三民主義專書的人。他說：『你可出十期。把那些問題寫完，就沒有有了』。我未置一詞。

但此刊物出了六十期才停止，不是無文，而是無錢。其第二期論文必須一述。即陳仲平之「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張絢中之「精神總動員與三民主義」、葉青之「三民主義的綜合性」、任一黎之「民族主義問題」、葉青之「實業計畫的經濟主張」、吳曼君之「總裁的國家思想（中）」等。

時代思潮三個影響

現在要說的，是「時代思潮」出版後，發生了三個影響：第一個是江西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第二個是桂林的「黨義週刊」之出版；第三個是重慶的「三民主義半月刊」之發行。現在說第一個吧。江西省政府熊式輝主席派其秘書徐晴嵐來重慶戰時寓所上龍塘灣，請我到江西中正大學任教，並參加熊主席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他說：「你在重慶只能講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到江西可以做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做須多人，熊主席要你帶些人去。」他又告我「在去之前，先請你到江西省政府講演。」我俱答應了，不久便往講演。

這個時間在民國廿九年上半年，講演題目就是在是年給四川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講過的「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那比較研究。四月十一至十三日在江西省政府禮堂講演，熊主席及各廳處長等均參加。十四至十七日給省黨部及省級各團體理監事講演。二十至二十一日給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教職人員講演，二十二日給贛縣各機構團體講演。五月一日至二日給江西行政講習會講演，其講稿均於四月二十八日到五月三日之間寫成，由江西力學書店出版成一專書，即以「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為名。

原稿帶回重慶後，因講演未帶書，特將引述大意之處，找出書來引用原語，分寄各雜誌發表。及後往中正大學任教，乘公路局車，經貴陽省會前往時，又被留駐數日，作了多處講演。然後到達江西泰和中正大學，講「三民主義」課程。教務處在每週要我講一次「三民主義的比較研究

」，俾全校未聽我的課程者，均有機會來聽講演，我答應了。因我推薦而同入中正大學研究部者，有好友楊燦、王貽非、張絢中、吳曼君、王集叢等人。

熊主席設立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其內分設六個專門委員會。我被聘為委員，兼第一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掌理三民主義的研究、講演事宜。前述楊燦等五人及內子尉素秋女士皆任第一專門委員會委員，撰述並講演三民主義。講演在必要時派往各縣市為之。第一專門委員會在「民國日報」編有「三民主義研究通訊」期刊一種。

「時代思潮」從第二十四期起，在江西泰和出版。本期之目次，依次言之，有葉青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論」，劉子健之「與毛澤東論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尉素秋之「民族主義的綜合性」，吳曼君之「民生史觀與階級鬥爭論」，張絢中之「國父的一次革命論與歐洲資本主義」，王貽非之「國父對於四種主義的批判」等。可見「時代思潮」有如第一專門委員會的機關刊了。

研究三民主義，以展開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不僅需要講演和報紙，而且需要書。我編選了「國父全集選本」和朱執信著「關於三民主義」二書，王貽非編選了戴季陶講「三民主義講演集」一書，我還編了「紀念國父講演集」一書，皆由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出版。當時的時代思潮社，除出版「時代思潮」雜誌或刊物外，亦出版書。就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的「

時代思潮」，其所載撰稿人在抗戰時代的著作，有二十二種，大多為三民主義著作。以後日益增多。如我的「孫中山全書提要」，尉素秋的「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踐」等書。這不大有助於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之開展嗎？

其中為我所著的，有「認識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三民主義之完美」、「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三民主義與自由」、「民生主義真解」。其它則有「抗戰中的問題」、「中國不可征服論」、「中國民族之偉大」、「統一與民主」、「從民主到憲政」、「黨派問題」、「怎樣健全國民黨」、「與社會主義者論中國革命」、「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有些書是在它處印行過的。像「毛澤東批判」，撰於泰和，出版於重慶勝利出版社。又像「中國共產黨的分析」，則僅在它處出版。亦有改名為「論中國共產黨」而出版者。這些書，亦有寫於抗戰初期而印行於抗戰中期者。

最高領袖優遇有加

我在中正大學任教快滿二年時，重慶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及戰時青年訓導團主任康澤將軍電請返重慶。及返，方知中央秘書處之職，有名無實。中央組織部朱家驊部長，請我往任其研究室主任。我向他建議辦「組織旬刊」，編輯組織叢書，以整理組織經驗，研究組織問題，建立組織理論，而加強組織工作。他以為然。於是「組織旬刊」出版了，要做組織工作者撰文。對於組織叢書，我寫了「組織原理」，部份發表於旬

刊上。旋因組織部長易人，旬刊及叢書均停止。但「組織原理」仍然出版，時在三十四年十月。

這時，我則專任戰時青年訓導團研究室主任。其地在興隆場附近五雲山(不大)的頂上(不高)。暫遷興隆場的朝陽大學，聘我往兼課，講「三民主義」課程。後來三民主義青年團辦中央幹部學校，蔣中正先生兼校長，蔣經國先生任教育長，聘我任教授，為研究部及專修科講「三民主義」課程。後來此校與中央政治學校合併為國立政治大學。我遂成為政治大學教授。那時，抗戰勝利，政府已遷都南京了。

但在勝利尚未到來的抗戰後期，國民參政會及研究五五憲章，思想已漸複雜。何況共產黨有公開發行的報刊多種呢？不用說還有民主同盟呢！因此，我同後任立法委員的湯如炎合辦「政治嚮導」，由訓導團嚴岳喬主編。我寫了很多文章談黨派問題及政治問題。書亦寫了不少。

首先要說的書，是「中國政治問題」。二十七年我在武漢時，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要統一全國軍方政治教材，約寫「中國政治問題」，要求依照「中國的現階段及其將來」而寫，六月下旬即完成，但對結論中三節要我修改，我不肯。支持者交了稿費，亦未印出。同年我到西安，西北出版社需要此文，我交它印出了。再版多次。西安拔提書店亦印行了。但我所願寫的「中國政治問題」，於三十一年著手，因此，到次年二月纔完成。出版之處在重慶就有國民圖書出版社(三十三年二月初版)、青年出版社(三十四年一月)、獨立出版社(同年九月)。此外有「民主政治

新論」(三十四年重慶獨立出版社)和「五五憲章研究」(三十五年上海大東書局)等書。

這些書，乃至在抗戰時期之所寫，其思想不外兩種：積極方面是肯定三民主義；消極方面是否定共產主義。一書而如此者，則可以「中國政治問題」為例。這是與抗戰初年所寫的「抗戰的根本問題」一樣的。此因三民主義合於抗戰需要，為求勝利之所必然。那就不能不反共了。果然，共黨在抗戰初年所發表的政治主張，都不合於抗戰需要，而走向失敗主義的。巴黎公社就是法國政府抗戰失敗而退往凡爾賽(Versailles)以後的事啊！

因此，我的思想與共相反，不得不竭力評其以謀抗戰的勝利。這是為了民族、為了國家之所必然。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根本與民族主義相反。何況我又截斷了他們的成功之路而歸於其自身之失敗呢？因此，他們用盡方法對付我，勢不兩立。據事後所聞，當時執政黨計劃成立國民參政會。由各黨派人士參加。其無黨派人士，則擬議及我。共產黨聞之派人告執政黨；無黨派人士如果有我，則共產黨便不參加國民參政會了。

據說：此事傳到蔣介石先生，使他感到中國這麼多人，共產黨都不怕，為甚麼怕葉青一人呢？因此，他在武昌召見一次。以後，我就屢蒙優遇了。茲舉一例。我在中正大學任教時，熊式輝主席到重慶謁蔣先生，他囑熊主席帶三千元贈我。及熊主席返泰和。省黨部梁棟書書記長聞之，特到我的寓所致賀說：「錢雖不多，但出自蔣先生之贈予。這就很難得了。」

其實，蔣先生之優遇，不止於此。而重要的則是我由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而中央常務幹事。還有呢？容後談及。至於我之加入國民黨，關係中央委員潘公展和葉楚傖二人之介紹。中央常會通過後，便任我為重慶市黨部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

以後，在抗戰後期發生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全體報名。我以年齡超過兵役年齡之故，遂對川渝各地之青年軍作巡迴講演很多，以振奮士氣。同時，每年由在學青年組成的暑期夏令營，亦常被派往講課。如四川之青城山、湖南之衡岳、雲南之昆明，就是例子。而中央訓練團及勞動局之訓練班等，亦被聘往講課。

三十四年五月舉行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先總裁兼團長，以為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應同黨中央委員一樣，以當然代表地位參加代表大會。這是對的。我於是參加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盡了獻替的責任。結果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因此又得參加第六屆中央全會以盡獻替責任，而謀黨之健全與進步。

同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接受波茨坦決議，宣佈無條件投降，全國歡騰。於是我在抗戰之初著的「抗戰的根本問題」，其七、「勝利終歸於我們」，便成為事實了。「中國不可征服論」一書，也成了事實。這不證明「抗戰的根本問題」和「中國不可征服論」所陳述理論之為科學的理論，經得考驗嗎？由此推之，我的書和文，雖有哲學性，同時也有科學性了。書被翻印和文被轉載

宣慰華北當選國代

於報刊或選入它書者甚多，亦有原因，非倖獲也！

這時，日本在中國的佔領地，完全歸還。就是抗戰以前所佔領的台灣、澎湖及東北，也光復了。所有不平等條約，完全廢除。其它如歐美各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所締結者，在抗戰後期，各國均主動提出，改訂平等新約了。民族主義在消極方面完全實現。歐美在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留英時，稱中國爲四強之一，即美、英、俄、中也。戴高樂返法，則稱五強之一，乃美、英、俄、法、中也。這是以八年抗戰實行民族主義之所致。

但是共黨利用抗戰以擴充軍隊和地盤，要利用俄援以武力奪取政權。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莫名其妙，反將共黨不參加聯合政府的責任歸之國民黨，竟以中共爲反對黨而助之，致對八年抗戰民窮財盡的國家拒予美援。然而蔣



任卓宣教授民三十六年在南京。

介石先生之召毛澤東來渝，並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以謀和平解決共黨、共軍問題，反而無成。而馬歇爾的調處又爲共黨所利用。及徐蚌戰爭失敗，副總統李宗仁主張和談。蔣先生遂宣告引退，讓李以代總統身份試驗和談。

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前，中央派黨國元老張繼先生宣慰華北五省市，即熱(河)、察(哈爾)、河(北)、平、津。他要我隨行，意在與淪陷多年的平、津學生講演。我隨他乘飛機往來，甚便。當抗戰之初，南京失陷，政府遷重慶時，他是黨史會主任，曾請我講三民主義。他是平民化的元老。及他到北平之日，各界招待他，並及於我。他對八年抗戰後初嘗家鄉味，尤其白菜，真是津津有味。

在北平和天津，各界代表同張先生舉行座談，我也參加。代表們向他訴苦說：政府與日軍戰敗撤退，把他們丟下。他們無法撤退，敵人將到未到時，又不能不組織維持會，以維秩序，並與敵人謀暫時的和平相處。否則人民的生命財產讓敵人要怎樣就怎樣，不損失更大嗎？所以維持會有苦心，也有必要的。乃勝利後派往接收的官員，就以維持會爲漢奸。他們深感苦痛，說得聲淚俱下。

這些話，是很有道理的。這裡要說我到平津，對知識青年作了多次講演。同時也發覺我同湯如炎合辦的「政治嚮導」和「中國政治問題」，都被北平翻印了。抗戰時代及勝利以後，還沒有聽著甚麼版權的話。只要感到需要，只要籌著印費，即可翻印。我從北平返重慶，政治協商會議

已過去了。但在國民黨內有反政協思想，認此爲黨的失敗，表明黨要革新，因此有了革新運動。

我一向堅持三民主義，因而擁護國民黨，不贊成聯合政府。政治協商會議與此相反，遂採取批評態度。其對的是各黨派及社會人士決議「一致遵奉三民主義爲建國之最高準繩」。對於召集國民大會，主張在已選足額代表外，另以七百名代表分配於共產黨、民主同盟(包括青年黨、民社黨)及國民黨，各依配額選派之。憲草問題，將五五憲草依三權分立及會議制、內閣制修改之。我對於這點，深不以爲然。曾作了一些修改政協憲草修改原則的活動。

政治協商會議後，國民黨第六屆二中全会開會，我參加了。對政協的憲草修改原則大加批評，決議是依照建國大綱制憲。對於政協配給國民黨的國民大會代表名額，由二中全会選舉，我當選了國民大會代表。革新運動在二中全会中會推派代表晉謁蔣總裁，報告革新意見，我也當選了。蔣總裁留我們餐敘。他不反對革新，且願見其成功。

後來，政府還都南京，我離開重慶較遲。革新同人到南京後，辦了一個「革新週刊」，以楊幼炯爲總編輯，我爲副總編輯。楊爲研究三民主義的先進，著述甚多。我到南京，只是寫了很多宣揚革新主張的文章，以充實革新週刊之內容。那時，國立政治大學設在南京，我是專任教授，同樣有課。而且我又是南京市黨部委員，並主持文化運動委員會。中國地方自治學會亦要我參加，我答應了。(未完待續)